

## 遼、夏遺存《華嚴經》相關問題考\*

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教授  
崔紅芬

### 摘 要

《華嚴經》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之一，應縣木塔、豐潤天宮寺塔和黑水城等遺存文獻中皆有保存。遼刻《華嚴經》存三種版本，木塔存第 1 號為第一種版本，第 2、3、4 號為第二種版本，天宮寺中存 80 卷為第三種版本。學界對木塔第二種版本《華嚴經》的觀點不一，而黑水城文獻保存《華嚴經》對遼刻經的研究有一定參考價值，學界對此鮮有關注。本文在前輩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把木塔存《華嚴經》與黑水城相關文獻進行比較，初步確定遼寺院曾雕印過行 15 字的藏經。這種裝幀藏經傳至西夏後，對秉常（1068-1086 在位）時期佛經裝幀產生了很大影響，也揭示了遼夏宋佛教文化交流互動關係。

**關鍵詞：**應縣木塔、黑水城文獻、華嚴經

---

\* 本論文為 2019 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課題階段性成果，批准號 19ZDA240；2018 年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和國別史等研究專項」項目階段性成果，批准號 2018VJX009。

應縣木塔、豐潤天宮寺塔和黑水城文獻中皆保存不同裝幀的《華嚴經》，遼刻《華嚴經》有三種版本，黑水城存《華嚴經》版本豐富多樣。學者對出土遼刻經已有深入探討，將遼刻經研究推向一個新高度。<sup>1</sup>但受遼刻經所出數量的限制，學界對應縣木塔第二種版本《華嚴經》的考證存在分歧。而與木塔相同或相類版本的《華嚴經》在黑水城文獻中卻多有保存，學界對此鮮有關注。本文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黑水城遺存《華嚴經》版本，分析遼、夏遺存《華嚴經》的關聯，進而探討宋遼夏佛教文化交流與影響。

## 一、遼刻《華嚴經》的遺存與學界的分歧

### (一) 應縣木塔遺存《華嚴經》

應縣木塔始建於遼道宗清寧二年（1056），在金、元、明進行增修和重修。《應縣木塔遼代密藏》一書收錄第 1-4 號為《華嚴經》，刻本卷軸裝，有千字文帙號，版本不同：

1 號《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7，東晉佛陀跋陀羅譯，首尾完整，帙號「垂」，從第 2-27 紙每紙 27 行，整行 17 字，版片標注依次為經名卷次、版片號、帙號，標在每版右端。佛經存有一長方形陽文楷書「寶嚴」戳記，上下單欄。

2 號《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4，唐實叉難陀譯，首尾皆殘，帙號「愛」。殘存三紙，第一紙與第二紙內容相接，第二紙與第三紙不相接。殘經每紙 28 行，行 15

<sup>1</sup> 祁英濤等：《山西應縣釋迦塔牌題記的探討》，《文物》1979 年第 4 期；國家文物局保護技術研究所、山西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等：《山西應縣佛宮寺木塔內發現遼代珍貴文物》，《文物》1982 年第 6 期；閻文儒等：《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發現的〈契丹藏〉和遼代刻經》，《文物》1982 年第 6 期；張暢耕《論遼朝大藏經的雕印》，《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6 年第 9 期；羅炤：《〈契丹藏〉的雕印年代》，《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3 年第 5 期；羅炤：《再談〈契丹藏〉的雕印年代》，《文物》1988 年第 8 期；羅炤：《有關〈契丹藏〉的幾個問題》，《文物》1992 年第 11 期；〔日〕竺沙雅章：《新出資料よりみな辽代の佛教》，《禪學研究》第 72 號，京都：花園大學禪學研究會，1994 年，第 1-20 頁；陳國瑩：《豐潤天宮寺塔保護工程及發現的重要遼代文物》，《文物春秋》1989 年創刊號；朱子方：《〈豐潤天宮寺塔保護工程及發現的重要遼代文物〉一文讀後記》，《文物春秋》1991 年第 2 期；畢素娟：《遼代的雕版印刷品》，《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6 年第 12 期；何梅：《房山石經與〈隨函錄〉〈契丹藏〉〈開元錄〉的關係之探討》，《佛學研究》1996 年第 2 期；徐時儀：《〈開寶藏〉與〈遼藏〉的傳承淵源考》，《宗教學研究》2006 年第 1 期；李富華：《論遼朝大藏經的雕印》，見楊曾文、方廣錫主編《佛教與歷史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年，第 481-513 頁；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第 127-160 頁；方廣錫：《〈遼大字藏〉的定名與存本》，見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總第 18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第 162-189 頁；方廣錫：《遼藏版本及〈遼小字藏〉存本》，《文獻》2015 年第 2 期；方廣錫：《第三遼藏探幽》，《世界宗教研究》2015 年第 3 期；杜成輝、李文君：《遼代的編輯出版業》，《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3 期；李際寧《佛經版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88-92、93-99 頁等。

字，版片號 3 處，依次標注經名卷次、版片號、帙號，標注在每版第一行與第二行之間，上下雙欄。

3 號《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6，唐實叉難陀譯，首尾皆殘，帙號「愛」，殘存兩紙，內容相接，每紙 28 行，行 15 字。版片號存有 2 處，依次標注經名卷次、版片序號、帙號，標注在每版第一行與第二行之間，上下雙欄。

4 號《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唐實叉難陀譯，首尾皆殘，帙號「首」，殘存兩紙，兩紙內容不相接，殘經每紙 28 行，行 15 字，上下雙欄，存版片號 2 處，依次標注經名卷次、版片序號、帙號，標注在每版第一行與第二行之間。<sup>2</sup>

從《華嚴經》版片號、行數、字數、字體和上下邊欄等判斷，它們屬於兩種版本，即《華嚴經》卷 47 為第一種版本，印「寶嚴」二字；《華嚴經》卷 24、26、52 為第二種版本<sup>3</sup>。這 4 卷《華嚴經》沒有雕印年代資訊，學者依木塔出《稱讚大乘功德經》尾題「時統和貳拾壹（1003）祀癸卯歲季春月冀生五葉記。弘業寺釋迦舍利塔主沙門智雲書」；《妙法蓮華經》（卷 4，甲）有「趙守俊刻於遼統和二十一年（1003）」；《上生經疏科文》有「遼聖宗統和八年（990）」，《妙法蓮華經》（卷 4，丙）有「遼聖宗太平五年（1025）」，《釋摩訶衍論通贊疏科》（卷下）「遼道宗咸雍七年（1071）」，及雜刻經中保存「遼道宗大康年間（1075-1084）、遼天祚帝天慶年號（1111-1120）」，並結合所出塔牌題記等，推斷「《遼藏》開始雕刻於遼聖宗朝（983-1031），因應縣木塔主佛像的年代晚於建塔年代，文物入藏時間應在遼末金初」。<sup>4</sup>

## （二）豐潤天宮寺塔存《華嚴經》

豐潤天宮寺塔建於遼清寧八年（1062），壽昌三年（1098）賜極樂院，乾統五年（1105）改天宮寺，金天會五年（1127）敕大天宮寺。天宮寺文獻被發現之後，陳國瑩先生對遺存文獻作了較全面的介紹，其中「《大方廣佛花嚴經》（B77，八卷，黃綾函套，長 26.5 公分，寬 17.5 公分，基本完好，時重熙十一年（1042）歲次壬午孟夏甲戌朔雕印記」。<sup>5</sup>後朱子方先生撰文指出應縣木塔與天宮寺塔出土佛經裝幀的不同，天宮寺塔 8 冊《華嚴經》是現在所見到遼刻 80 卷《華嚴經》的第二種版

<sup>2</sup> 參見山西省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主編：《應縣木塔遼代密藏》，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年，第 11-12 頁。

<sup>3</sup> 下文對木塔《華嚴經》卷 24、26、52，皆稱第二種版本。

<sup>4</sup> 山西省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主編：《應縣木塔遼代密藏》，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年，第 19 頁。

<sup>5</sup> 參見陳國瑩：《豐潤天宮寺塔保護工程及發現的重要遼代文物》，《文物春秋》1989 年創刊號。

本。<sup>6</sup>李際寧先生對《華嚴經》的介紹最為詳細，對尾題也進行錄文。大致情況如下：

《花嚴經》一函八冊，函套外封為蟹青色，正中粘經名，名簽「大乘花嚴經」。函套口裝細竹簽，有蟹青色帛帶。每冊封面、封底均為藍色遼宮錦，錦面織有排列規則的八瓣小花圖案。蝴蝶裝訂線本，葉高 26.6 釐米，半葉寬 17.3 釐米，版高 23.9 釐米，版寬 15 釐米，每版 10 行，行 30 字，全書共 850 葉，上下單欄，左右雙欄，8 冊千字文號依次為「平、章、愛、育、黎、首、臣、伏」八個字。在第 1、2、5、6、7 冊後有題跋：

大契丹國燕國長公主奉為先皇御靈，冥資景福，太后聖壽，永保遐齡，一人隆戴門之尊，正後葉齊天之算，太弟、公主，更析脈於銀潢，親王、諸妃，長分陰於玉葉，次及有職，後逮含情；近奉慈尊，遠城佛道。特施淨財，敬心雕造小字《大花嚴經》一部，所冀流通，悉同利樂。時重熙十一年歲次壬午孟夏月甲戌朔雕印記。燕京左街僧錄崇祿大夫檢校太保演法通慧大師、賜紫沙門瓊煦提點雕造。<sup>7</sup>

此《華嚴經》的雕刻年代在重熙十一年（1042），由燕京左街僧錄崇祿大夫檢校太保演法通慧大師、賜紫沙門瓊煦提點負責雕造。它雖與應縣木塔唐實叉難陀譯《華嚴經》帙號相同、經題相同，但其版式裝幀屬於蝴蝶裝訂線本，每版 10 行，行 30 字，與應縣木塔兩種版本《華嚴經》不同，可視為遼刻《華嚴經》的第三種版本。

除《華嚴經》題記外，《金光明最勝王經》題記有「清寧五年（1059）歲次六月甲子朔十三日丙子雕畢流通」，《大乘本生心地觀經》有「咸雍六年（1070）十一月奉宣雕印」，《一切佛菩薩名集》有「皇朝七代歲次癸巳重熙二十有二年（1053）律中大呂冀生十萃午時序說」，《法華經》有「咸雍五年（1069）燕京弘法寺都勾當詮法大德沙門方矩，提點雕造天王寺文英大德賜紫沙門志延校勘」等，天宮寺塔所出遼代刻經主要集中在遼興宗和道宗朝，主要為刻本卷軸裝、刻本蝴蝶裝、改為刻本包背裝等。

應縣木塔和天宮寺塔所出佛經都與燕京雕印地有密切關係，遼太宗會同元年（938）十一月升幽州為南京，又曰燕京，燕京是遼都城之一，也是經濟文化中心，

<sup>6</sup> 朱子方：《〈豐潤天宮寺塔保護工程及發現的重要遼代文物〉一文讀後記》，《文物春秋》1991 年第 2 期。

<sup>7</sup> 李際寧：《豐潤所出小字本遼藏》，見李際寧《佛經版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97-98 頁。

經濟繁榮，佛教興盛，不僅有房山雲居寺續雕石經，而且還在燕京設立印經院，雕印藏佛或寺院刻經，散施各寺院流通，有些經屬於民間社邑或寺院雕印。



豐潤天宮寺塔《華嚴經》<sup>8</sup>（圖 1）

### （三）學界對遼刻《華嚴經》的分歧

因正史記載缺失，而保存下來遼代藏經和遼刻經佛經又較少，給考證《遼藏》帶來了一些困惑。學界對於天宮寺塔《華嚴經》的觀點基本一致。羅炤先生認為天宮寺塔「紙薄字密」佛經是《契丹藏》的復刻本單刻經。<sup>9</sup>李富華先生認為豐潤天宮寺塔小字《遼藏》沒有自己獨立的目錄體系，是卷裝大字本《遼藏》的復刻藏。豐潤發現的《遼藏》印本，與應縣發現的《遼藏》印本分別屬於兩種《遼藏》版本，兩個版本《遼藏》是同一個目錄體系，它們的區別一是卷裝大字的版本，一是依大字本復刻的小字冊裝的版本。<sup>10</sup>方廣錫先生認為天宮寺塔所出 8 冊《華嚴經》非大藏經本，是遼燕國長公主所雕造的單刻本，雖有千字文帙號，可判定其單刻本的底本出於某部大藏經，但該經本身依然屬於單刻本。他還分析天宮寺塔所出佛經只有《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屬於《遼小字藏》。<sup>11</sup>學界認為天宮寺塔《華嚴經》是單刻本，底本出自某部大藏經。

學界分歧主要體現在應縣木塔第二種版本《華嚴經》上。閻文儒、張暢耕、畢素絹等撰文將木塔有帙號的 12 卷刻經定為《遼藏》<sup>12</sup>，後張暢耕等也認為《遼藏》有 11 卷<sup>13</sup>，而《應縣木塔遼代密藏》中依然延續了 12 卷的觀點，即 4 個編號《華嚴經》全都視為《遼藏》。

羅炤先生對 12 卷本《遼藏》提出異譯，認為第 6 號《稱讚大乘功德經》和第 5 號《妙法蓮華經》雖有帙號，但其版式與其他 10 卷不同，不應是《契丹藏》，應

<sup>8</sup> 圖片為河北省圖書館李彥麗提供，特此感謝。

<sup>9</sup> 羅炤：《〈契丹藏〉的幾個問題》，《文物》1992 年第 11 期。

<sup>10</sup>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第 131、142 頁。

<sup>11</sup> 方廣錫：《遼藏版本及〈遼小字藏〉存本》，《文獻》2015 年，第 2 期。

<sup>12</sup> 閻文儒等：《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發現的〈契丹藏〉和遼代刻經》，《文物》1982 年第 6 期。

<sup>13</sup> 張暢耕、畢素絹：《論遼朝大藏經的雕印》，《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6 年第 9 期。

為單刻經。<sup>14</sup>他把應縣木塔 10 卷《遼藏》分為兩種，即《應縣木塔遼代密藏》所列第 1、7、8、9、10、11、12 號為一種版本，共 7 卷，包括東晉佛陀跋陀羅譯《華嚴經》；而第 2、3、4 號《花嚴經》為另一種版本。<sup>15</sup>羅先生還推測第二種版本要晚於第一種版本，屬於另一本《契丹藏》或是復刻《契丹藏》的單刻本。<sup>16</sup>李富華、何梅好像沒顧及羅先生的觀點，依然將應縣木塔 12 卷本有帙號的佛經全部視為《遼藏》<sup>17</sup>。

日本學者竺沙雅章也對木塔有帙號的 12 卷佛經作了區分，分為 4 類，即一類為第 1、7、9 號，第二類為第 8、10 號；第三類為第 11、12 號，第四類為 2、3、4、5、6 號。他認為屬於《遼藏》的只有 7 卷，第四類也就是第 2、3、4 號《華嚴經》、第 5 號《妙法蓮華經》和第 6 號《稱讚大乘功德經》不是《遼藏》。<sup>18</sup>竺沙雅章與羅昭先生的 10 卷觀點有差異，羅先生認為木塔第二種版本《華嚴經》是《遼藏》，竺沙雅章認為非《遼藏》，還認為「至今沒有發現宋代有 15 字的藏經，因此無法確定它是哪種藏經的零本。這 3 卷《華嚴經》經文間均標有朱點，他們並非收藏在某寺的經藏中，而是供個人讀誦或學習用的經卷，這 3 卷很難被視為《契丹藏》」。<sup>19</sup>因資料缺乏，竺沙雅章的結論比較謹慎，認為第二種版本《華嚴經》或是某部藏經的零本或是據藏經刊刻的單刻經。

方廣錫先生贊同竺沙雅章的觀點，將 7 卷《遼藏》定名為《遼大字藏》，認為它們是《遼大字藏》的標準經本，即每版 27 行，每行 17 字。<sup>20</sup>方先生指出「木塔第二種版本《華嚴經》符合大藏經本的基本特徵，而與《遼大字藏》完全不類，絕不可能屬於《遼大字藏》，它們屬於新藏經的可能性非常小，而是零刻單本的可能性很大」。<sup>21</sup>方先生鑒於木塔第二種版本《華嚴經》與木塔遼代其他刻經、豐潤天宮寺塔的版式有著明顯的差異，還提出第三種《遼藏》的設想。他把《華嚴經》與韓國中央研究院藏書閣的高麗刻本《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進行比較考證，但

<sup>14</sup> 羅昭：《〈契丹藏〉的雕印年代》，《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3 年第 5 期。

<sup>15</sup> 羅昭：《〈契丹藏〉的雕印年代》，《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3 年第 5 期。

<sup>16</sup> 羅昭：《有關〈契丹藏〉的幾個問題》，《文物》1992 年第 11 期。

<sup>17</sup>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第 129 頁。

<sup>18</sup> 〔日〕竺沙雅章：《新出資料よりみた辽代の佛教》，《禪學研究》第 72 號，京都：花園大學禪學研究會，1994 年，第 9-10 頁，並在此感謝趙新玲說明搜集此資料。

<sup>19</sup> 〔日〕竺沙雅章：《新出資料よりみた辽代の佛教》，《禪學研究》第 72 號，京都：花園大學禪學研究會，1994 年，第 11 頁。

<sup>20</sup> 方廣錫：《〈遼大字藏〉的定名與存本》，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總 18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sup>21</sup> 方廣錫：《〈遼大字藏〉的定名與存本》，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總 18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最終確認它們不是同一部藏經的單刻本。<sup>22</sup>方先生的研究方法為我們繼續探討宋遼夏時期遺存的文獻提供了很好思路。

## 二、遼夏遺存《華嚴經》之關聯

方先生認為木塔第二種版本《華嚴經》比較特殊，歷代寫經大藏、刻經大藏，從未見過……確實沒有任何一點線索……除非將來真的發現遼宋所刻 28 行，行 15 字的大藏經，否則我們不能認為木塔第二種版本《華嚴經》是大藏經本。<sup>23</sup>無獨有偶，黑水城文獻中保存一件漢文《華嚴經》(TK-88)，與木塔第二種版本《華嚴經》一致。西夏與宋遼鼎立而存，國祚 2 個世紀，佛教興盛，黑水城遺存佛教文獻為進一步探討遼刻經和遼夏關係提供了重要材料。

### (一) 與木塔第二種版本裝幀相同《華嚴經》

應縣木塔第二種版本《華嚴經》與宋藏經版本不同，與黑水城文獻收錄的一件殘經正好相同。俄藏黑水城漢文本《華嚴經》(TK-88)為西夏刻本，卷軸裝，潢楮紙，裂成 2 段，有佚文，第 1 段高 29.5，長 131.5，第 2 段高 29.5，長 480，共 12 紙，紙幅 53.5，版框高 24.2，天頭 3.6，地腳 1.6，每紙 28 行，行 15 字，上下雙欄，(圖 3)，每紙第 2 行右側偏上刻小字經名「行願經二」，隔 28 行「行願經三」，以此類推，一直到「行願經十四」，以「十四」計用紙序書，也就是版片號，無帙號，有尾題「大延壽寺演妙大德沙門守瓊散施此經功德。大安十年(1083，惠宗秉常在位)八月 日流通」。<sup>24</sup>

可知，木塔第二種版本《華嚴經》(圖 2)與黑水城《華嚴經》(TK-88)(圖 3)的裝幀、紙張、行數、字數、框高、欄線等完全一致，西夏刻本的潢楮紙也就是遼代應縣木塔的硬黃紙，因為紙張入潢後成為硬黃紙。我們可確認黑水城本與木塔第二種版本《華嚴經》所據的底本是相同的。西夏廣泛輸入周邊政權文化和佛經，從宋遼傳入很多經典，宋版沒有 15 字佛經，《華嚴經》(TK-88)所據底本應是從遼傳入的。

二者不同之處是木塔為唐實叉難陀譯本，有帙號，每版開頭依次標注經名卷次、版片序號、帙號；而黑水城是唐般若譯本，每版開頭也依次標注經名、版片號，

<sup>22</sup> 參見方廣錫：《第三種遼藏探幽》，《世界宗教研究》2015 年第 3 期。

<sup>23</sup> 方廣錫：《第三種遼藏探幽》，《世界宗教研究》2015 年第 3 期。

<sup>24</sup> 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分所、中國社科院民族所等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 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318-325 頁。

無帙號。黑水城本《華嚴經》字體與木塔本不同，說明黑水城本是據傳入漢文本重新雕板的寺院刻本。



應縣木塔存《華嚴經》卷 26 之一 (圖 2)



俄藏黑水城漢文 TK-88 (圖 3)

黑水城與應縣木塔《華嚴經》比較 (應縣木塔採用方先生的資料)：

序號	出土地	經名	框高	紙寬	行數	字數	帙號	欄線	裝幀	紙張
1	木塔	華嚴卷24	23.5	30.5	28	15	愛	上下雙欄	刻本 卷軸裝	硬黃紙
2	木塔	華嚴卷26	23	30.2	28	15	愛	上下雙欄	刻本 卷軸裝	硬黃紙
3	木塔	華嚴卷51	23.6	29.7	28	15	首	上下雙欄	刻本 卷軸裝	硬黃紙
4	黑水城 TK-88	華嚴卷40	24.2	29.5	28	15	無帙號	上下雙欄	刻本 卷軸裝	潢楮紙

既然黑水城保存的是般若譯 40《華嚴經》，那遼是否雕印般若譯《華嚴經》呢？學界認為《房山石經》是依據遼藏經鑿刻的，因《房山石經》中帶千字文帙號的遼代刻經與應縣木塔《遼藏》一致，李富華先生還比較《石經簡目》和《續一切音義》，確定《房山石經》沒有刻《新華嚴經》(40 卷本)，但「它的帙號位置卻保留下來，帙號被空在那裡，不僅有力地說明《遼藏》刻了 40 卷《新華嚴經》，而進而證明《房山石經》沒有改變《遼藏》的原貌」，<sup>25</sup>按李先生的描述，《遼藏》曾雕刻般若譯《華嚴經》，帙號應為「戎、羌、遐、邇」，與之前 60 卷《華嚴經》(帙號「坐、朝、問、道、垂、拱」)和 80 卷《華嚴經》(帙號「平、章、愛、育、黎、首、臣、伏」)正好相接。遼代雕印般若譯《華嚴經》沒有保存下來，而相同版式的私刻本卻在黑水城文獻中得以保存，這也為瞭解遼刻等提供了參考。

黑水城《華嚴經》(TK-88)有尾題「大延壽寺演妙大德沙門守瓊散施此經功德。大安十年(1083, 惠宗秉常在位)八月 日流通」,「大延壽寺」西夏史料無考,而《遼史》多處記載遼代皇帝幸延壽飯僧,遼聖宗統和七年(989)三月「已未,

<sup>25</sup>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第 148 頁。

幸延壽寺飯僧」，<sup>26</sup>八年（990）「幸南京，戊戌，以景宗石像成，幸延壽寺飯僧」，<sup>27</sup>以及遼興宗重熙元年（1032）遼興宗幸延壽、延洪二寺等，重熙十一年（1042）「己酉，以宣獻皇后忌日，上與皇太后素服，飯僧於延壽、憫忠、三學三寺」<sup>28</sup>。可見，遼代延壽寺是燕京一座著名皇家寺院，佛教興盛。如果遼延壽寺是黑水城文獻中的大延壽寺，那說明《華嚴經》（TK-88）是延壽寺守瓊雕印散施的。守瓊除了雕印散施《華嚴經》外，是否還雕印其他尚需進一步考證。守瓊本沒有帙號，而中國藏黑水城出土漢文 M1.1414[F14:W13]《華嚴經》卷 13「光明覺品第九」帙號「章」，俄藏黑水城 B62 漢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首題下有「卷第一 平」。可見黑水城漢文本《華嚴經》帙號與遼代應縣木塔所出《華嚴經》帙號一致，它們與 P.3313 號《開元目錄》則記載《新華嚴經》八帙為「平、章、愛、育、黎、首、臣、伏」相同，而與童瑋《北宋〈開寶大藏經〉雕版考釋及目錄還原》、《25 中藏經目錄對照考釋》所列《金藏》之 80 卷《華嚴經》帙號「垂、拱、平、章、愛、育、黎、首」，及《25 中藏經目錄對照考釋》所列《開寶藏》之《華嚴經》帙號「拱、平、章、愛、育、黎、首、臣」不同。

守瓊本與前述天宮寺《華嚴經》重熙十一年（1042）單刻本版、木塔第一種遼藏版不同，而與宋版藏經每紙 23 行，行 14 字版的行字數僅差一字，是否受到宋版藏經的影響？羅炤先生把《遼藏》分為兩種版本，即統和本（983-1011）、重熙-咸雍本（1032-1074）。統和本共 505 帙，編校主持人是詮明（曉），目錄為《開元釋教錄·入藏錄》，即詮明所撰《續開元釋教錄》（三卷）。重熙-咸雍本共 579 帙，編校主持人是覺苑，目錄是太保大師覺苑所撰《契丹藏》入藏錄。<sup>29</sup>現存金碑《西京大華嚴寺重修薄伽藏教記》載「遼重熙間（1032-1054），複加校證，通制為五百七十九帙，則有太保太師《入藏錄》具載之，云：今此大華嚴寺，從昔已來，亦是有教典矣」。燕京天王寺文英大德志延法師撰《暘臺山清水院創造藏經記》也載：「今優婆塞南陽鄧公從貴善根生得淨行日，咸雍四年三月舍錢三十萬葺諸僧舍，又五十萬募同志印《大藏經》，凡五百七十九帙。」<sup>30</sup>故此，學者認為「始自遼興宗重熙年間，至遼道宗咸雍四年（1068）已有 579 帙全遼藏印出」的觀點。<sup>31</sup>也就是說，在咸雍四年（1068）之前已有不同版本藏經流傳。

宋版大藏經修訂本是在宋真宗乾興元年（1022）贈予遼朝，那遼統和本早於宋版藏經傳入，而重熙-咸雍本在宋版藏經傳入之後雕印，但統和本和重熙-咸雍本《遼

<sup>26</sup>（元）脫脫等撰：《遼史·聖宗本紀（三）》卷 12，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 年，第 134 頁。

<sup>27</sup>（元）脫脫等撰：《遼史·聖宗本紀（四）》卷 13，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 年，第 144 頁。

<sup>28</sup>（元）脫脫等撰：《遼史·興宗本紀（二）》卷 19，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 年，第 228 頁。

<sup>29</sup>羅炤：《再談〈契丹藏〉的雕印年代》，《文物》1988 年第 8 期。

<sup>30</sup>（清）王昶撰：《金石萃編》卷 153，影印本。

<sup>31</sup>羅炤：《〈契丹藏〉的雕印年代》，《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3 年第 5 期。

藏》版藏經版本我們並不清楚，而遺存宋代刻經和寫本藏經還有其他版本存在。天宮寺存《華嚴經》雕刻時間在重熙十一年（1042），黑水城重雕印本在夏大安十年（1083），延壽寺守瓊本或許就出現在宋乾興元年（1022）之後，夏大安十年（1083）之前。

## （二）與木塔第二種版本裝幀不同的佛經

### 1. 改為上下單欄經典

黑水城西夏文《佛說阿彌陀經》《菩提勇識之業中入順》（又稱《入菩薩行》）也屬於刻本卷軸裝，行 15 字版本，只是欄線和所用紙質不同。

《阿彌陀經》存三個館冊號，紙質 8 級。館冊第 4844 號為 21×180 釐米，首殘，每行 15 字，上邊距 3 釐米，下邊距 1 釐米，b 面邊距 1 釐米，上下單欄。館冊第 4773 號為 20×65 釐米，僅存經尾，每行 15 個字。上邊距 2.5 釐米，下邊距 1.2 釐米，上下單欄。結尾處重複經題，題記漢譯為：白高國大安十一年八月八日，傳譯經典、證義及說經、律、論和尚顯布，施寫者和尚馬智慧，刻字者李什德、柳奴孛名，發願者……。館冊第 7564 號為 19.5×130 釐米，僅存經首，每行 15 個字，上邊距 3 釐米，下邊距 0.7 釐米，上下單欄。卷子僅存經首處有版畫。經題後有秉常皇帝（尊號「德成國主、福盛民正、大明皇帝嵬名」）及其母梁皇太后（尊號「天生全能、福祿法儀、國正皇太后梁氏」）御譯。<sup>32</sup>

西夏文《佛說阿彌陀經》為同一版本，三個館冊號可以綴合，與漢文《華嚴經》（TK-88）雕印僅相差一年，也是秉常時期翻譯雕印完成，雕印西夏文時欄線發生變化。

《入菩薩行》亦存 3 個館冊號，刻本卷軸裝，行 15 字，紙質 1 級。館冊第 781 號，上部，刻本，卷子裝，27×400 釐米，首殘，每行 15 個字，上邊距 2 釐米，下邊距 1.6 釐米。結尾處重複經題。經卷在西夏時期做過修復；館冊第 788 號，中部，刻本，卷子裝，27×395 釐米，首殘，每行 15 個字，上邊距 2 釐米，下邊距 1.5 釐米。經卷僅存經首處被撕掉；館冊第 944 號，下部，刻本，卷子裝，31×1014 釐米，全文保存，每行 15 個字。上邊距 6 釐米，下邊距 3 釐米。尾題後有作者和譯者的名字：「顯但吟哇菩薩造，傳譯證義主、講經律論國師、沙門德源奉敕所譯」。<sup>33</sup> 西夏文《入菩薩行》沒有雕印年代，僅有德源國師譯，皇族嵬名僧人，有譯文證義勾管、講經律論者、功德司正頭銜，他所譯經有仁孝尊號「奉天顯道光耀武宣文神

<sup>32</sup> 漢譯文是崔紅芬據俄文、西夏文翻譯，參見 Е.И.Кычанов，*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1999г. стр.354-355.

<sup>33</sup> 漢譯文是崔紅芬據俄文、西夏文翻譯，具體參見 Е.И.Кычанов，*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1999г. стр.494.

謀睿智制義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可見，德緣（源）是仁孝時期或之前一位高僧，他可能在乾順時就參與譯經活動，繼續沿用秉常時期的裝幀版本。

西夏文《阿彌陀經》《入菩提行》為上下單欄，與漢文《華嚴經》（TK-88）上下雙欄不同，而與方先生提及的韓國藏《藥師經》的欄線相同，《藥師經》有千字文帙號「鞠」，從該經版片號的形態判斷，它是部底本源自遼藏的另刻單經。<sup>34</sup>韓國藏《藥師經》有帙號，為遼天祚帝乾統二年（1102）壬午歲高麗國大興王寺奉宣雕造，說明行 15 字版也曾傳入高麗<sup>35</sup>。西夏文《阿彌陀經》《入菩提行》無帙號，《阿彌陀經》雕印年代為大安十一年、遼大康十年（1084），而《入菩薩行》的雕印應在仁孝時期。可見，行 15 字版佛經往東傳入高麗，往西傳入西夏，高麗雕印本保留帙號，西夏文則為私刻本。

木塔本、韓國本行 15 字佛經皆有帙號，而上述黑水城本皆未有帙號，那傳入西夏底本是否有帙號呢？中國藏黑水城文獻有一件漢文 F14：W13《華嚴經》卷 13「光明覺品第九」（圖 4），實叉難陀譯，僅存一葉，刻本，蝴蝶裝？上下雙欄，右側單欄，無法判斷每紙的行數，整行 15 字，經題下有帙號「章」，經題前下面有雙行小字「大夏圓寂寺，賀家新施經」。這是西夏寺院新雕印單刻本，它與木塔第二種版本《華嚴經》帙號相同，字數相同，裝幀不同。可以說遼代有帙號的《華嚴經》也傳入西夏，F14：W13 延續遼藏經的特點，在裝幀上發生了變化。



中國藏黑水城漢文《華嚴經》卷 13 殘葉（圖 4）

黑水城漢文《華嚴經》（F14：W13）皆有帙號，其帙號與遼宋漢文本帙號相同，而西夏文《華嚴經》使用二套帙號，與漢文藏經截然不同。西夏文第一套用經名帙號法，1-10 卷、𪛗（大），11-20 卷、𪛗（方），21-30 卷、𪛗（廣），31-40 卷、𪛗（佛），41-50 卷、𪛗（華），51-60 卷、𪛗（嚴），61-70 卷、𪛗（經），71-80 卷、𪛗（典），譯為「大方廣佛華嚴經典」。第二套出處還不得而知，1-10 卷、𪛗（了、悟、明、達、通），11-20 卷、𪛗（資），21-30 卷、𪛗（生、產），31-40 卷、𪛗（鐵），41-50 卷、𪛗（生），51-60 卷、𪛗（東、尾），61-70 卷、𪛗（江、河），71-80 卷、

<sup>34</sup> 方廣錫：《第三種遼藏探幽》，《世界宗教研究》2015 年第 3 期。

<sup>35</sup> 根據方先生《〈遼大字藏〉的定名與存在》的考證，高麗還有小字遼本藏經的存在。

幌（月、山），可譯為「明資產鐵生東河山」。<sup>36</sup>可見，西夏文《華嚴經》吸收漢藏經帙號表示的同時，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 2. 改為刻本經折裝的《華嚴經》

除了上述提及與木塔第二種版本相同《華嚴經》（TK-88）和欄線改為單欄的《阿彌陀經》《入菩薩行》外，及至西夏仁孝、純祐和金朝時，行 15 字《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大量存在，裝幀演變為刻本經折裝，上下單欄。分幾種情況：

其一《普賢行願品》（TK-98）等，未染麻紙，每折 6 行，行 15 字，TK-98 為天慶三年（1196），經文句末有各種尾花和數字，相當於版片號。結尾處有羅皇太后施經發願文。

其二《普賢行願品》（TK-99、100）未染麻紙，每折 6 行，行 15 字，句末有各種尾花和數位，尾題接《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咒》，有羅皇太后施經發願文，內容與 TK98 相同，天慶三年（1196）。TK-99 經題下有「行一」，每隔 5 折葉有「行二」，以此類推一直到「行十二」，尾題後有「太原崇福寺沙門澄觀校勘詳定譯」，下接《華嚴感通靈應傳記》，僅印施題記缺。

其三《普賢行願品》（TK-73、258）潢楮紙，每折 5 行，行 15 字等。

這些編號《普賢行願品》從刻本卷軸裝的演變為刻本經折裝，大多屬於西夏仁孝皇后羅氏為紀念仁孝去世三周年私刻印佛經，雕印數量多，紙質不同，也有尾花和版片號或行號，字數上延續前朝，而裝幀改為經折裝。夏天慶三年（1196）時，宋版《崇甯藏》譯經雕印完成，刻本經折裝的版本廣為流傳，為西夏吸收使用。

除《華嚴經》外，黑水城漢文《阿彌陀經》（TK-109、111）、《金剛經》（TK-115、124、125、126、127、179）、《佛說金輪佛頂大威德熾盛光如來陀羅尼》（TK-129）、《佛說業報經》《佛說無常經》《大佛頂白傘蓋心咒》（TK-137）、《佛說三十五佛名經》（TK-140、DX.1336）、《仁王護國經》（TK-141）、《夾頌心經》（TK-158、159）和《密教儀軌》（TK-163）等為刻本經折裝，或每折 5、6、7 行，行 15 字。西夏文《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妙法蓮花經》《大寶積經》《佛說阿彌陀經》《大般涅槃經》《現在賢劫千佛名經》《金光明最勝王經》《佛說父母恩重經》《十一面神咒心經》《大方廣佛華嚴經》《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等或刻本經折裝，每折 5 或 6 或 7 行，行 15；或寫本經折裝，每折 5 或 6 行，行 15 字；或刻本蝴蝶裝，每半葉 6 或 7 或 8 行，行 15 字。其中的《華嚴經》《大寶積經》《佛說長阿含

<sup>36</sup> 文志勇：《西夏文〈華嚴經〉帙號考》，杜建錄主編《西夏學》（第 19 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273 頁。

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金光明最勝王經》《大般涅槃經》《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有帙號，它們也是秉常和其母梁氏時翻譯成西夏文的。行 15 字的漢、夏版本在西夏秉常時期大量出現流行是很有趣的現象。

總之，黑水城文獻中涉及行 15 字版本的佛經有十餘部，有與木塔第二種《華嚴經》版本完全一致的《華嚴經》(TK-88, 卷 40)；有刻本卷軸裝不變，欄線改為單欄且用紙不同的《阿彌陀經》《入菩薩行》等；還有裝幀發生變化，有帙號或無帙號的《華嚴經》(F14: W13)，刻本經折裝漢、夏本《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等十餘部佛經，及金刻本經折裝，行 15 字《華嚴經》。此外，韓國藏《藥師經》刻本卷軸裝，行 15 字，帙號屬於《遼藏》體系等。黑水城、應縣木塔、豐潤天宮寺塔、韓國等地保存如此之多的行 15 字佛經，有《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和其他經典。如果說它們是單刻本好像也不合適，那我們可認為遼某個寺院曾雕印行 15 字版藏經，它沒有獨立經目體系，在版本上吸收了宋版藏經的一些特點，這也驗證了羅炤先生推測的木塔第二種版本《華嚴經》要晚於第一種遼藏經的觀點。

### 三、遼宋夏文化的交流互動

#### (一) 黑水城其他版本《華嚴經》

除了行 15 字版本外，黑水城文獻中其他版本《華嚴經》或《普賢行願品》也多有存在。《普賢行願品》(TK-61、62、63、63A、64、66、69、71、161、162) 西夏刻本，經折裝，未染麻紙或潢麻紙或未染楮紙，每折 6 行，行 18 字，上下雙欄，有太原崇福寺沙門澄觀校勘詳定譯，下接《華嚴感通靈應傳記》，印施題記「大夏乾祐二十年歲次巴西三月十五日(1189.4.2, 仁宗在位)，正宮皇后羅氏謹施」，經文首行下有字「行一」，每隔 5 折面有「行二」，表示版片號。TK-65、67、68、160 為西夏刻本，經折裝，潢楮紙，版框高 23.2，每紙 6 行，行 18 字，上下雙欄，有太原崇福寺沙門澄觀校勘詳定譯，下接《華嚴感通靈應傳記》，經文首行下有字「行一」，每隔 5 折面有「行二」，表示版片號，尾題佚。TK-72 為西夏刻本，經折裝，白麻紙，版框高 22.5，每折 5 行，行 15-17 字，上下單欄，經末有雙行小字「京市周家□□僧，雕字人王善慧」，下接《華嚴感通靈應傳記》，大夏天盛辛巳年(1161, 仁宗在位)施。TK-146、147 為西夏刻本，經折裝，未染麻紙，版框高 14.8，每折 5 行，行 14 字，上下單欄。TK-256 為西夏刻本，經折裝，未染麻紙，版框高 11，每折 4 行，行 11 字，上下單欄等。還有《華嚴經梵行品》(TK-185) 宋刻本，經折裝，白麻紙，版框高 11.9，每折 4 行，行 9 字，上下單欄，辛未<sup>37</sup>太原王簡施。《華嚴經梵行品》(TK-246、255) 金刻本，經折裝，未染麻紙，版框高 14.5，每折

<sup>37</sup> 辛未年或仁宗天聖九年(1031)或哲宗元祐六年(1091)。

5 行，行 9-10 字，上下單欄淨信弟子李。可知，不論是西夏刻本還是宋金刻本，它們皆沒有帙號，屬於寺院刻本或私刻本。西夏刻本主要集中在仁孝時期，由羅皇后在天盛年辛巳年（1161）、乾祐二十年（1189）雕印散施。

西夏文《華嚴經》也有其他裝幀，存 140 多個館冊號，為寫本經折裝、刻本蝴蝶裝，它們每折（半頁）6 或 7 行，行 16、17、18、19、20、21、22、16-17、17-18、18-20、18-21、17-20、17-21、17-22、19-20、19-21、19-27、20-21、20-24、21-22、22-25 字；寫本貝葉裝，每頁 30 行，每行 14 字，或每頁 22 行，每行 13 字。<sup>38</sup> 據殘存題記判斷，它們雖有帙號，並非全是入藏經典，有私刻單本或私抄本存在。

總之，黑水城遺存《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裝幀版本豐富多樣，有入藏本也有私刻本。它們或延續唐朝風格，或繼承宋代版式，或有遼代刻經特點等，學界所認為的漢文大藏經三種體系在黑水城文獻中都有遺存，這充分反映了西夏對宋遼，乃至前朝佛教文化的廣泛吸收繼承與發展。

## （二）宋遼夏文化的互動

西夏、遼、宋為三足鼎立分裂時期，也是不同民族文化大融合時期。在宋、遼、夏關係中，李華瑞先生認為「契丹給宋造成的亡國威脅遠大於西夏，而西夏給宋造成的國防壓力則遠甚與契丹……宋一些有識之士對如何處理與遼、夏關係的態度有很大不同，對遼主張以德懷遠，維持和平局面的觀點占主流，而對西夏則有主戰、主和之爭，甚至以武力制服西夏的論調在北宋中後期占一定上風」。<sup>39</sup> 在相互制約又互為利益的三角關係中，除了維持政治平衡和軍事較量外，經濟、文化的交往也是必不可少，尤其在陸路交往方面。西夏據河西，控荒漠，地理位置極為重要，夏與遼、夏與宋關係的好惡直接影響著遼、宋與西域的交往；在東來西往的文化交往中，西夏也成為東來西往文化交流的中轉站。這一時期不僅形成了遼、宋、西夏文化交流圈，也出現了以宋、遼、西夏為大中心的陸路和海路文化交流圈。在不同政權的交往中，佛教和佛教文獻在很大程度上起著媒介和潤滑劑作用。

官方佛教文獻的交流首當其衝是《開寶藏》（971-983），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官刻卷軸裝大藏經，也是影響很廣的大藏經。自《開寶藏》刷印流通後的百余年間，宋還有三次重要的校勘修訂，陸續增入《開元釋教錄》遺漏未編、貞元入藏錄所載典籍及宋咸平、天禧、熙寧年間新譯經論，形成了三個不同版本。宋真宗時官方藏經外傳，乾興元年（1022）《開寶藏》天禧修訂本贈予遼朝，宋天禧三年（1019）

<sup>38</sup> 原文為俄語，涉及到佛經、題記有西夏文，本文中使用的漢文是崔紅芬、文志勇翻譯成漢文的，見 E.И.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1999г. стр.301-317.

<sup>39</sup> 李華瑞：《宋夏關係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354 頁。

「十一月東女真國入貢，乞賜大藏經，詔給與之。」<sup>40</sup>宋版藏經先後傳入女真國和遼國，對其他應產生一定影響。宋真宗曾說：戎羯之人，崇尚釋教，亦中國之利，可給糧，聽其請。<sup>41</sup>宋以正統自居，樂意將佛經施給周邊政權，希望以文化的輸出達到「使夷不亂華」的目的，以佛教文化教化周邊民族。宋在彰顯其國富民強、快怏大國風度的同時，自然也促進了不同民族文化交流與相互影響。

宋版藏經不僅傳入遼、高麗，也傳入西夏。從宋仁宗天聖九年（1031）夏德明到宋神宗熙寧六年，夏天賜禮盛國慶四年（1073）秉常皇帝的四十余年間，西夏先後六次向宋獻馬請賜佛經，並修建承天寺塔貯存佛經，以此底本翻譯成西夏文。<sup>42</sup>宋版藏經傳入西夏的時間比傳入遼、女真的時間要晚，西夏向宋請賜了《開寶藏》修訂版、宋新譯經和譯經人員等，近 30 部宋新譯傳入西夏，其中不同裝幀的《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等在應縣木塔、豐潤天宮寺塔和黑水城都有保存。宋實行譯經的審查制度，宋譯《頻那夜迦經》因宣揚「葷血之祀」「厭祖之詞」，宋真宗不得入藏，可西夏文《頻那夜迦經》卻保存下來。這說明宋夏遼既有官方的文化交流，也存在廣泛的民間、僧人的文化交往。

西夏據漢文佛經翻譯成西夏文，有官方設立的譯場，也有寺院譯經。私人或寺院譯經在黑水城文獻題記中多有記載，不一一羅列。而官方的譯經從元昊創制文字開始，到乾順民安（1090-1097）初年，完成了西夏文三百六十二帙，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仁孝皇帝參照南經、北經校勘西夏譯經，國圖藏元刊西夏文《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發願文記載，「戊寅（1038-1048）年中，國師白法信及後治平年（1087-1090）臣智光等先後三十二人為首依令番譯。民安（1090-1097）初年，五十三年國內先後大小三乘、半滿法<sup>43</sup>皆有盛傳，已成三百六十二帙，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後護城帝詔依南北經重校，使國內茂盛，慧提照世，法雨普潤天下」。史金波先生認為「南經指宋《開寶藏》，北經指遼朝《契丹藏》」。<sup>44</sup>可見，西夏譯經、校經參照了不同版本藏經。

至於遼刻經何時、以何管道傳入西夏沒有記載，是否有完整的《遼藏》傳入也未有記載。從史料分析，遼刻經傳入西夏與夏遼三次聯姻有密切關係，也與夏永為遼藩輔有關。遼統和四年（986）遼同意把義成公主嫁於繼遷。遼景福二年（1032）元昊繼夏國主，再次娶遼興平公主。遼乾統五年（1105）遼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

<sup>40</sup>（宋）志磐：《佛祖統紀》卷 44，《大正藏》第 49 冊，第 2035 號，第 406 頁上欄 23。

<sup>41</sup>（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2「大中祥符二年條」，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第 1643 頁。

<sup>42</sup> 崔紅芬：《西夏河西佛教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年，第 193-194 頁。

<sup>43</sup> 半滿法指小乘、大乘佛法。

<sup>44</sup>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83 頁。

下嫁夏國王李乾順。在百餘年的時間，夏遼三次聯姻，建立遼夏聯盟，西夏接受遼的冊封，從一定程度上密切了遼夏雙方文化交往。

乾順與遼聯姻在遼晚期，遼社會動蕩戰亂不止，且乾順民安（1090-1097）初年西夏文大藏經已翻譯完成，再結合黑水城漢文《華嚴經》（TK-88）的雕印時間是夏大安十年（1083）等情況，我們可以認為遼刻行 15 字藏經在元昊、諒祚時就已傳入西夏。

這與遼刻經的傳播也是一致的，現藏於河北涿州咸雍四年（1068）刊《新贖大藏經建立香幢記》記載了咸雍二年（1066）免稅贖經。<sup>45</sup>從遼慶州白塔（在內蒙古巴林右旗）發現的佛經年代看，以燕京為中心雕印的佛經，早在遼聖宗開泰年間（1012-1021）已傳入慶州一帶。慶州白塔是遼興宗母親所建釋迦佛舍利塔，佛塔始建於重熙十六年（1047）二月十五日，建成於重熙十八年（1049）六月十五日，並在年內完成法舍利的裝藏。1988 年維修佛塔時發現刻本卷軸裝《華嚴經》（1 卷）有「取則于燕京聖壽寺藏，開泰二年（1013）六月一日，請處士樊承遵放法華座主藏院內起於雕版，開泰五年（1016）雕畢，六年（1017）印刷，法華座主弟子惟德述新雕小字法華經記」。《佛形像中安置發舍利記》（小字版）其二卷有「燕京憫忠寺抄主無礙大師門人□志淵依燕本雕印散施，開泰十年（1021）上京福先寺」<sup>46</sup>。這說明遼聖宗開泰年（1012-1021）以來燕京雕印完成的佛經逐漸傳至遼慶州、應縣、天宮寺等地，各地寺院也不斷重新雕印，再次外傳。

遼景福二年（1032）遼夏再次聯姻，夏福聖承道三年（1055），諒祚與其母承天寺，迎請回鶻僧人居之，從事講經弘法活動。沒藏氏與諒祚時臨聽焉。<sup>47</sup>可以說，元昊、諒祚時期有宋版藏經和遼刻藏經都傳入西夏。夏拱化五年（1067）冬，諒祚「遣使進貢回鶻僧、金佛、《梵覺經》」，<sup>48</sup>夏天儀治平元年（1087），崇宗乾順即位，第二年遼封乾順為夏國主，天祐民安六年（1095）乾順「進貝多葉佛經」。<sup>49</sup>西夏先後兩次給遼進獻回鶻僧、譯經也是雙方文化交流密切的體現。西夏初期的國師白法信和安全國師白智光即是回鶻高僧，國圖藏西夏文《現在賢劫千佛名經》之「譯經圖」展示了秉常譯經的盛況，譯經場的譯主則是回鶻僧白智光。回鶻佛教興盛，回鶻僧至西夏從事譯經，白智光參與諒祚、秉常時期的譯經，譯經完畢，為了答謝遼代賜經，向遼進獻回鶻僧、佛像、佛經等。乾順民安初年（1090-1097）西夏文

<sup>45</sup> 楊衛東：《與〈契丹藏〉有關的一件石刻——讀遼咸雍四年刊〈新贖大藏經建立香幢記〉》，《文物春秋》2007年第3期。

<sup>46</sup> 參見德新等：《內蒙古巴林右旗慶州白塔發現遼代佛教文物》，《文物》1994年第1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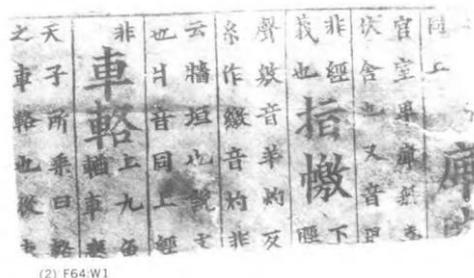
<sup>47</sup>（明）胡汝礪編，陳明猷校勘：《嘉靖寧夏新志》，卷2，第152-153頁。龔世俊等校證：《西夏書事校證》，卷19，第226頁。

<sup>48</sup>（元）脫脫等撰：《遼史·道宗本紀（二）》卷22，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年，第267頁。

<sup>49</sup>（元）脫脫等撰：《遼史·道宗本紀（六）》卷26，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年，第308頁。

大藏經基本反映完成，在民安六年（1095）夏再次向遼進獻佛經，順便向遼告知譯經的情況等。

遼夏除官方交往外，遼藏經和刻經還通過聯姻、僧人交往、中轉貿易和邊境部落的叛降等管道傳入西夏。黑水城文獻中還保存遼五臺山僧人道殿《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TK-270 刻本經折裝，每折 6 行，行 13 字）<sup>50</sup>，遼法悟《釋摩訶衍論贊玄疏》（TK-79、80，清寧八年（1062）完成並作序，線訂冊頁裝，買半頁 7-8 行，行 15-21 字，每半頁 8 行，行 19-22 字），遼希麟的《續一切經音義》（F64：W1）（圖 5）<sup>51</sup>和通理恒策《通理大師立志銘性海解脫三制律》（TK-134，宋刻本蝴蝶裝，每半頁 7 行，行 14 字）、《究竟一乘圓明心義》（館冊第 2848 號，刻本蝴蝶裝，每半頁 7 行，行 18 字）和圓通法師的《鏡》（館冊第 2548 號，刻本蝴蝶裝，每半頁 7 行，行 15 字）等也傳入西夏，或保存漢文本，或被翻譯成西夏文。遼代僧人的著作能及時傳入西夏並保留在黑水城文獻中，說明雙方關係密切和交流的頻繁。遼宋代刻經傳入西夏、高麗，也經西夏傳入吐魯番地區，在柏孜克裡克石窟發現了多件遼代刻經。<sup>52</sup>



中國藏黑水城漢文《續一切經音義》殘葉（圖 5）

黑水城文獻各類裝幀皆有保存，佛經用紙複雜，漢文有潢楮紙、潢麻紙、白麻紙、未染麻紙等，西夏文佛經的用紙更加複雜，俄已故學者捷連吉耶夫-卡坦斯基通過技術檢測將西夏紙分為八個等級，一級紙質地最好，八級紙使用最廣，不同質地紙張規格也不一樣。<sup>53</sup>西夏紙張缺乏，很多紙張依賴從宋、遼、金進口，紙張規格也決定了寺院刻經的裝幀版本，西夏雕印佛經既保存了原傳入漢文版本的裝幀，

<sup>50</sup> 崔紅芬：《西夏漢傳密教文獻研究》，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年，第 267 頁。

<sup>51</sup> 刊佈者定名為辭書，見李逸友：《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91 年，第 202 頁，以及後面所附圖版第 47。

<sup>52</sup> 武海龍等：《吐魯番博物館所藏〈契丹藏〉佛經殘片考釋》，《西域研究》2019 年第 4 期。〔日〕松井太撰，鞏彥芬譯：《契丹與回鶻的關係》，《河西學院學報》2018 年第 3 期。李際寧：《敦煌莫高窟北區 B53 窟除土漢文〈華嚴經〉版本考》，見《佛教大藏經研究論稿》，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第 34-42 頁。

<sup>53</sup> E.И.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1999г. стр.2.

也有受《崇甯藏》版式影響而改變的裝幀。西夏不僅從宋、遼接受佛經，而且還把西夏文佛經進獻遼國，遠傳西域回鶻王國，在柏孜克裡克石窟發現 4 件西夏文佛經，3 件藏於吐魯番博物館，<sup>54</sup> 1 件藏於德國柏林民俗博物館，編號 T.M.190。<sup>55</sup>

宋夏遼文化融攝發展的局面對後世也產生了很多影響，遼、北宋滅亡，金朝在遼宋文化的基礎上，繼續發展佛教，雕印佛經，金仿《開寶藏》復雕了《金藏》，金刻藏經和私刻經皆傳入西夏<sup>56</sup>、西域<sup>57</sup>等處，這也成為我們瞭解宋、西夏、金等民族文化交往的珍貴資料。

綜上所述，作為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華嚴經》在遼應縣木塔、天宮寺塔和黑水城文獻都有保存。本文章在對遼刻《華嚴經》進行梳理和瞭解學界分歧的基礎上，將木塔《華嚴經》與黑水城相關文獻進行比較，初步確定遼寺院曾雕印過行 15 字藏經，並通過遼夏聯姻等在秉常大安十年（1083）之前傳入西夏。西夏依據傳入的宋、遼版漢文藏經重新雕印，或翻譯成西夏文後雕版印刷，但行 15 字版本對秉常朝佛經裝幀產生很大影響，黑水城文獻保存《華嚴經》《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等十餘部佛經裝幀版本與木塔第二種版本相同或類似。它們的存在也見證了遼、宋、西夏間文化的交流與互動。

（為撰寫本論文，得到侯沖、伍小喆和趙新玲等先生提供資料的說明，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sup>54</sup> 吐魯番地區文物管理所：《伯孜克裡克千佛洞一致清理簡記》，《文物》1985 年第 8 期。

<sup>55</sup> 孫伯君：《德藏吐魯番所出西夏文〈郁伽長者問經〉殘片考》，《寧夏社會科學》2005 年第 5 期。

<sup>56</sup> 在黑水城文獻中還保存金朝刻本佛經，以及一幅「平陽姬家雕印」的「四美圖」，有提款為：「綠珠、王昭君、趙飛燕、班姬」，其頂端刻有一行大字題記「隋朝窈窕呈傾國之芳容」。還保存金刻本經折裝《普賢行願品》（TK-142），未染楮紙，每折 6 行，行 15 字，上下雙邊，施經者為安亮等；《普賢行願品》（TK-243）每折 6 行，行 15 字，白楮紙，上下單欄。金刻經折裝 80 卷《華嚴經梵行品》（TK-246、255）每折 5 行，行 9-10 字，上下單欄，淨信弟子李。金刻本經折裝《華嚴經》（TK-261），每折 9 行，行 11 字，白楮紙，下單欄。另在敦煌莫高窟北區 B53 窟也發現金刻漢文刻本經折裝《華嚴經》殘葉。

<sup>57</sup> 黨寶海：《吐魯番出土金藏經》，《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4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103-125 頁。